



两岸四地新诗文体比较研究

王 珂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两岸四地新诗文体比较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12YJA751058）资助



两岸四地新诗文体比较研究

王珂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两岸四地新诗文体比较研究 / 王珂著.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 - 7 - 5130 - 3384 - 8

I. ①两… II. ①王… III. ①新诗 - 文体 - 诗歌研究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07.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0657 号

责任编辑: 刘睿文
文字编辑: 文藏



责任校对: 董志英
责任出版: 刘译文

两岸四地新诗文体比较研究

Liang'an Sidi Xinshi Wenti Bijiao Yanjiu

王珂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责编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113

发行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101/8102

印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mm × 960mm 1/16

版次: 2015年4月第一版

字数: 437千字

ISBN 978 - 7 - 5130 - 3384 - 8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编: 100088

责编邮箱: liurui@cnipr.com

发行传真: 010 - 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印 张: 29.25

印 次: 2015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72.00元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绪论 概述	(1)
第一章 总体研究	(24)
第一节 大陆和台湾中年诗人写作比较	(24)
第二节 台湾新世代诗人文体观念诗体意识	(39)
第三节 台湾中生代诗人大陆纪游诗	(57)
第四节 香港新诗文体特征及香港诗人诗体观	(70)
第五节 澳门新诗文体特征及澳门诗人诗体观	(86)
第六节 大陆甘肃诗人写作生态功能文体透析	(106)
第二章 个案研究	(121)
第一节 台港澳诗人研究	(121)
一、郑愁予	(121)
二、绿蒂	(126)
三、雪飞	(135)
四、席慕容	(139)
五、古月	(149)
六、张默	(155)
七、鸿鸿	(169)
八、傅天虹	(191)
第二节 大陆诗人研究	(202)
一、义海	(202)
二、许德民	(214)
三、梁志宏	(225)

四、屈文焜	(234)
五、牛昌庆	(241)
六、白红雪	(245)
七、谭仲池	(261)
八、包容冰	(271)
九、西篱	(277)
十、龙彼德	(284)
十一、桂兴华	(288)
十二、哈雷	(291)
第三章 作品研究	(297)
第一节 昌耀《内陆高迥》	(297)
第二节 于坚《纯棉的母亲》	(305)
第三节 阿信《如来八塔和十二美少女》	(310)
第四节 胡续冬《海魂衫》	(314)
第五节 顾北《假设比想象来的真实》	(319)
第六节 万小雪《爱情踩着风降临》	(329)
第七节 惟夫《正面与侧面》	(334)
第八节 高凯《百姓中国》	(341)
第四章 策略研究	(348)
第一节 新诗文体的合法性反思	(348)
第二节 叙述改变新诗文体反思	(355)
第三节 新诗诗美的构建策略	(367)
第四节 新诗诗体的构建策略	(374)
第五节 新诗诗体学的构建策略	(380)
附录一 为诗消得人憔悴的学者	(394)
附录二 诗为青春作伴与作证的浪漫时代	(427)
附录三 慈师严师，大爱如父	(442)
参考文献	(452)

绪 论

概述

“新诗”是“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两岸四地（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地区）、东南亚、北美等地，其中两岸四地，特别是大陆和台湾最为重要。诗歌生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诗歌功能，诗歌功能决定诗歌文体，诗歌文体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诗歌价值。新诗是富有政治性的特殊文体，新诗生产场是社会性极强的生产场，是特殊的社会运作系统，受到意识形态和社会权力的巨大影响，还受到通用知识和普遍伦理的控制。尽管两岸四地都是用现代汉语作白话诗运动产生的诗，这种汉语文学的抒情体裁可以更准确地被称为“现代汉诗”，它保证了汉语抒情文学发展的统一性和连续性，然而地域空间、政治体制、文化记忆等原因，尤其是政治原因，形成不同的诗歌生态，导致文体的功能、形态甚至价值都有差异。比较研究两岸四地的新诗文体具有重要的诗歌、文化和政治意义。两岸四地新诗文体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研究，可以为四地的联系，特别是为政治和文化交流提供经验。

体裁在文学流变中占有重要位置，体裁的稳定性保证了文学传统的客观存在，也为文学的现代化提供了基础。巴赫金认为：“文学体裁就其本质来说，反映着较为稳定的、‘经久不衰’的文学发展倾向。一种体裁中，总是保留着已在消亡的陈旧的因素。自然，这种陈旧的东西所以能保存下来，就是靠不断地更新它，或者叫现代化。……在文学发展过程中，体裁是创造性记忆的代表。正因为如此，体裁才能保证文学发展的统一性和连

续性。”^① 华夏儿女遍布世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华文文学”。大陆学界30多年来统称“华文文学”，成立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已召开了18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近年来，海外学者造出一个英语词语 Sinophone，可译为“华语语系”。“Sinophone Literature 的概念，最初是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的史书美（Shu-mei Shih）教授提出的。作为出生于韩国、在台湾接受教育然后留美的第二代华人，史教授希望以此概念抗衡中国大陆的文学生产。我想，Sinophone 这一概念的潜能不止如此。在我看来，华语语系文学及人文视野提供了一个新的批评的界面。由此视之，新加坡不仅是一个人来人往的枢纽（hub），而且自成一处有创造力的场域（productive site），凭借其独特的位置与视角，产生新的动能。这和人来了人又走了、或许什么也没留下的‘枢纽’的性质是很不一样的。”^② “华文文学”与“华语语系文学”之争，既证明巴赫金所言的体裁才能保证文学发展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也说明不同政治文化生态下存在的体裁会有差异性。

“新诗”这种体裁的基本特征是用现代汉语写作，表现的是现代情感，具有现代精神和现代意识。可以用一个更科学的术语来取代“新诗”，那就是“现代汉诗”。正是现代汉语、现代情感及现代精神保证了华文文学中的这种抒情文体的相对统一性和连续性。但是新诗是富有政治性的先锋文体，也是一种社会运作系统，受到权力、知识和伦理的控制。新诗革命是政治文化革命的急先锋，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尤其是在大陆，新诗近30年的最大成就是促进了思想解放、推进了民主进程。台湾诗坛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现代派”运动和“民族化”运动，大陆诗坛50年代的“新民歌”运动，都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台湾的“海洋诗歌”、香港的“都市诗歌”也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对两岸四地，特别是大陆和台湾的新诗文体进行比较研究，如同巴赫金强调的“对话”、哈贝马斯重视

^① [俄] 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玲译：《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

^② 新加坡《联合早报》：“‘华语语系’（Sinophone）的概念提供了新的批评界面：王德威教授专访”，载 <http://www.douban.com/note/239107395>，2012年9月23日访问。

的“交往”，不仅具有重要的诗歌意义，还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种地域育一种文学。很早就有人意识到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史达尔认为：“我觉得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存在着，一种来自南方，一种源出北方；前者以荷马为鼻祖，后者以莪相为渊源。……北方人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追忆的形象间存在着差别。气候当然是产生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① 地域对文学的影响也是有限的，特别是在现当代，现代交通工具大大缩短了地区之间的时空距离，现代通信技术结束了“家书抵万金”的思念时代，经济全球化狂潮加强了区域之间的文化联系，甚至一些文化观也改变了政治文化的力量对比。尽管没有出现“大同”世界，地区间的纽带却越系越紧，文化交流越来越多，政治对话越来越频繁。政治上的互信不仅缩短了交往的心理距离，也改变了空间距离，如过去海峡两岸“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的悲惨现象已成历史。地域文化、政治经济等原因，特别是政治原因，形成了诗歌生态颇异的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四大新诗生产场。生态决定功能，功能决定文体，文体决定价值。尽管都用现代汉语写诗，新诗却在四地的文体功能、文体形态甚至文体价值等方面都有差异。

20世纪华文世界政治运动风起云涌，新诗写作既具有个人性，更具有社会性和时代性。“凡文学事实都必须有作家、书籍和读者，或者说得更普通些，总有创作者、作品和大众这三个方面。于是，产生了一种交流圈，通过一架极其复杂的，兼有艺术、工艺及商业特点的传送器，把身份明确的（甚至往往是享有盛名的）一些人跟多少有点匿名的（且范围有限的）集体联结在一起。”^② 甚至作品解读也是一个生产场，解读“场域”决定着解读者的言说内容和话语方式。历史原因造成两岸四地既同又异的知识、

① [法] 史达尔：“论文学”，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125页。

② [法] 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的原则和方法”，见罗贝尔·埃斯卡皮著，王美华译：《文学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权力和伦理，它们对新诗文体的形成和流变也构成了较大威胁。“要想把在一定的历史—地理环境中牢固地扎了根的某种体裁移植于另一种历史—地理环境中，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对这类不成功的移植实验的研究可以表明东西方的巨大差异，并解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①如叙事风格的散文诗移植到诗的国度——中国，自然转变成了偏重抒情风格的散文诗。仅以散文诗为例，大陆有人主张它是诗，也有人主张它是散文，在台湾却少有这样的文体归宿争论，甚至用“分段诗”来指称这种文体。

不可否认，新诗文体在两岸四地之间有“横的移植”现象，如从大陆“移植”到香港，不仅本土的香港诗人受到大陆新诗的直接影响，从大陆去的“移民诗人”也是在大陆接受的新诗教育，如傅天虹（后来傅天虹又到了澳门）。有的香港诗人早就是大陆的著名诗人，如林子中年才移居香港。在20世纪80年代，流沙河等大陆诗人把台湾诗人的诗作介绍到大陆，影响了很多大陆诗人，特别是青年诗人的创作。2013年9月28日，在南京先锋书店主办的“漂泊的诗人”两岸诗人座谈会上，大陆青年诗人朵渔告诉台湾老诗人洛夫，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时读到的台湾现代诗给了他巨大影响。这也是一种“移植”现象。

“横的移植”并不能消除差异。用现代汉语写的这种诗歌文体在大陆的主要称谓是“新诗”，在台湾既称为“新诗”又称为“现代诗”或“现代新诗”。以几部重要的台湾新诗著作和诗选的书名为例，萧萧的《台湾新诗美学》（2004年）、杨宗翰的《台湾现代诗史》（2002年）、白灵的《新诗30家》（2008年）、张默的《现代女诗人选集》（2011年）。又如一些台湾学者把“散文诗”称为“分段诗”，罗青认为：“散文诗，其名甚谬，驳之者众，然众说纷纭，至今尚未有一切实可用的新名称。因其形式有别于‘分行诗’，故我建议不妨称之为‘分段诗’。”^②大陆则统一称为

① [美] 韦斯坦因著，刘象愚译：《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

② 罗青：《从徐志摩到余光中——白话诗研究（第一册）》，尔雅出版社1988年版，第248页。

“散文诗”。

新诗在台湾长时间地被称为“现代诗”，与新诗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受到西方现代诗歌运动的影响有关，更与台湾一些诗人鼓吹“横向移植”西方现代诗有关。白话诗运动出现了诗体“西洋化”甚至“全盘西化”。如梁实秋在1930年12月12日给徐志摩的信中说：“我一向以为新文学运动的最大的成因，便是外国文学的影响；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①台湾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现代派诗歌运动，纪弦于1953年创办《现代诗》季刊，1956年1月在台北召开现代诗人第一届年会，正式宣布成立“现代派”，提出“现代诗六大信条”。在同一时期，大陆更强调“纵的继承”。1951年2月19日，冯雪峰在《我对于新诗的意见》中主张：“我觉得将来新诗形式的建立，可以假定有如下的三类：一类是‘自由诗’，即‘散文诗’，无论分行或不分行，但语言必须比现在的更精炼，也更经济。第二类是从民歌蜕化出来的，就是说，虽然比原来的民歌已经有变化，但是保持有有规律可寻的格律的。从这种蜕化来创造格律，当然是新的创造，并且是很要紧和有成效的创造。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就已经给这种创造带来了好的消息。这作品应该是这一类创造的一个起点。第三类是根据人民口语，创造完全新的各种格律。但这三类，都只有精通了人民语言，并且下极大苦工，才能够一步一步地实现。”^②由此可见，如果比较大陆和台湾在相同时段，特别是在两岸政治对抗及军事对峙时期的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则不难发现有完全不同的诗歌生态和风格迥异的诗歌文体。

“血浓于水”，除韩国的许世旭等少数诗人外，各地的新诗诗人大多是华夏子孙，祖先都生活在“诗的国度”，不少人受到中华文化及古代汉语诗歌传统的潜移默化和中国现代诗歌文体的直接影响，新诗文体在四地都

^① 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见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页。

^② 冯雪峰：“我对于新诗的意见”，见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下编）》，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有“纵的继承”关系。台湾很多诗人，特别是余光中、郑愁予、文晓村、张默、洛夫、金筑等老一辈诗人都是因为战乱由大陆去台湾的。以文晓村为代表的葡萄园诗人面对台湾现代诗狂潮，提出了“健康、明朗、中国”的方针，在以后的40多年中坚持走“民族化”道路。

四地在诗歌教育和诗歌接受上也有差异。以“朦胧诗”为例，谢冕在发表于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中说：“的确，有的诗写得很朦胧，有的诗有过多的哀愁（不仅是淡淡的），有的诗有不无偏颇的激愤，有的诗则让人不懂。”^①叶维廉却说：“所谓‘朦胧’，所谓‘难懂’，对大陆以外一般的读者而言，根本不存在。这些诗被批判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用了多重意义多重指涉的意象和隐喻。……在大陆，长久以来，作者、读者一再走向一种观察现实的方式，走向一种表达现实的方式。”^②

“任何价值系统都形成一种意识形态，很明显，一种意识形态只能存在于通过转移而被重新构建的境况之中。”^③在当代，四地的最大差异在意识形态，即政治文化上的不同。不同的意识形态造成了不同的新诗生态和新诗功能，导致了新诗文体的差异。即使在同一地区，意识形态也在发生剧烈变化。如近30年是大陆改革开放、文化大转型时期，但各地的政治开放程度及文化转型力度都颇有差异，有的地区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有的仍是现代社会，有的还没有完全进入现代社会。这造成新诗生态的复杂多变，导致新诗功能和文体的巨大差异。如20世纪80年代流行集体化写作，90年代流行个人化写作，21世纪初流行私人化写作，近年又流行底层写作。大陆80年代有政治抒情诗和政治讽刺诗，90年代却销声匿迹。

^① 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见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下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254~255页。

^② [美]叶维廉：《中国诗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73~274页。

^③ Judith Williams. *Decoding Advertisements*. London: Robert MacLehose and Company Limited, 1978, p. 43.

甚至突发事件也会改变诗人的诗歌观念及诗歌的创作生态，导致新诗功能与文体变化。如大陆的“震灾诗写作”，既有自发的写作，也有自觉的写作；诗人既有自然人的情感，更有社会人的情感。震灾诗强化了新诗的实用性、抒情性和严肃性，新诗诗人的介入意识及使命意识和新诗的写作伦理及入世价值，受到高度重视，持续了十多年的个人化写作被削弱。针对校舍是豆腐渣工程所导致学生受难的事实，多年未见的“愤怒出诗人”现象涌现，不少诗人写起了针砭时弊的政治抒情诗。如在新华社供职的福州诗人谢宜兴以新闻记者的敏锐和诗人的敏感，在2008年6月19日凌晨写了《不该是你们——写给汶川大地震废墟下不再醒来的孩子们》：“不该是你们背负坍塌的天空/不该是你们遭受死神的突袭/不！不该是你们！孩子/你们只是初萌的叶芽/不可能为了撑起春天的冠盖/泥土下把手伸向别人的土地/不可能为了挨过秋风的追逼/脚跟前堆起一片片谎言/还没开花，不可能发出芳香的毒/还没长枝，不可能结出错误的果/所有的罪过都是我们的/可是谁把你们当成替罪的羔羊/如果因此无由地向你们道歉/只能说明我们虚伪而矫情/如果因此侥幸而向你们致谢/也只会更显我们的残忍和丑恶/苟活的人啊，是否感到有什么/正在锯着我们的良心和灵魂/可有谁能告诉我，在汶川/在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苍天是否打了盹上帝是否出了错/如果他们也有良知，是否感到/从此自己也多了一分罪孽。”这首诗不仅有“悲伤”，更有“悲愤”和“鞭挞”。但是“震灾诗”运动过后，政治抒情诗和政治讽刺诗又退出了大陆诗坛，个人化写作再次流行。

台湾的“现代诗六大信条”也涉及政治，如第六条强调追求自由与民主，还卷入了“政党、体制之争”。甚至现代汉语诗歌这种文体的称谓，也受到政治影响。“对这些连自己都看不懂的怪诗和伪诗，纪弦十分恼火，乃至宣布‘现代诗是邪恶的象征’，要取消现代诗。正因为这个原因，‘新诗’的名称在1970年代以后又再度流行起来。但‘现代诗’的名称已经写进1960年代以来的诗史，成了取代过去流行的‘新诗’术语，并以此作

为和大陆诗区隔的一个标杆，谁要‘取消’它也难。”^① 新诗术语命名的话语权特征显而易见。

“和一切艺术家一样，每个诗人都有其所属的社会背景，甚至更代表了不同的意识或价值。”^② 由于时局动荡，台湾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政治诗”。世纪之交，诗人，特别是中年诗人更关注社会生活，甚至直面政治。简政珍是台湾著名的新诗学者，他追求诗的艺术性，也不回避诗人的责任，他的一首诗的题目甚至是《流水的历史是云的责任》。他在诗中宣称：“我们要为失足的政客准备拐杖/我们更需要一口深井/去承载口水的回音。”他甚至还自信地说：“我们将以如下的言语作为生命的传承：/云的责任不是流水的历史。”台湾诗人，特别是中生代诗人对政治的强烈关注正是由台湾近年的政治生态决定的。简政珍的一首诗的题目正是《岛国风暴》，这个题目可以用《台湾动荡政治》来取代。雪莱曾说诗人是栖息在黑暗中用美妙的声音来安慰自己寂寞的夜莺，荷尔德林写出了“人诗意地栖居”这样的诗句，古代汉诗有山水诗及田园诗，人类甚至出现过素朴的“牧歌”时代，即使在感伤的“浪漫时代”，诗人仍然有“诗意”的生态。受到“岛国风暴”影响的简政珍，在诗中发出的不仅是深沉的“喟叹”，还是愤怒的“质问”：“看了政客们谜似的笑容/你怎么还能和花园里的小鸟对话？”为了更好地采用诗表现社会政治生活，如同当年黄遵宪用长诗体来记录中日战争等重大社会事件，具有强烈使命意识的简政珍放弃了短小的抒情诗，甚至还放弃了长诗，写起了“诗小说”。“简政珍于 2004 年 3 月 28 日完稿的‘诗小说’——《放逐口水的年代》长诗（409 行），为台湾‘现代长诗’确立了‘文类越界’的体制。”^③ 多位台湾诗人都认为小诗及抒情诗等抒情文体无法抒写宏大沉重的题材，题材与体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跨界”写作甚至“跨界”艺术获得很多诗人，尤

① 古远清：《台湾当代新诗史》，天津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92 页。

② 余光中：“种瓜得瓜，请尝甘苦——读詹澈的两本诗集”，见詹澈：《詹澈诗选》，台海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39～340 页。

③ 蒋美华：“新世纪台湾长诗美学的航向”，载《台湾诗学学刊》五号，第 136 页。

其是鸿鸿等青年诗人的青睐。

在台湾的中年诗人中，詹澈的人生具有传奇色彩。他1978年从军中退役后成了“为民代言”甚至“为民请命”的“农民诗人”。由于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马英九等台湾政要都参加了他的婚礼。他坚决主张诗人应该有使命感：“我不想只是成为一个‘农民诗人’，而是做为一个‘诗人’。”^①“成为”诗人与“做为”诗人的社会生活存在方式有质的差别，后者强调参与社会运动的主动性。他是介入生活社会最深入的台湾当代诗人之一，不仅把诗当成行动的“号角与喇叭”，用诗来启蒙甚至宣传大众，他还争当社会运动的领袖。2002年11月23日，他领导12万农渔民大游行，是这次“与农共生”运动的总指挥。“一件艺术品，经常是情感的自发表现，即艺术家内心状况的征兆。如果它再现的是人，那么它或许就是某种面部表现的复制，示意着这些人应有的情感。也可以说它表现着情感赖以发生的社会生活，即表明了人们的习俗、衣着、行为，反映了社会的混乱与秩序，暴力与和平。此外，它无疑可以表现作者的无意识愿望和梦魇。”^②詹澈的诗抒发的通常是社会情感。“詹澈被誉为‘目前最有潜力为中下层农民画像的新写实主义诗人’。（蒋韵语）其深受乡土文学派的思想启蒙，反对权威，反对专制，诗作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倾向。”^③

古代汉诗极端重视格律诗的主要原因是受到统治者的倡导甚至高压。科举制度实行了1300多年，试帖诗和八股文成为考试的两大文体。当代新诗的文体建设，特别是以自由诗和新格律诗为代表的诗体建设也一直受到政治的巨大影响。大陆于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新格律诗和新民歌分别由文化官员何其芳和国家领袖毛泽东倡导。何其芳本身就是著名诗人，他出

① 詹澈：“堡垒与梦土”，见詹澈：《詹澈诗选》，台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380页。

② [美]苏珊·朗格著，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页。

③ 张羽：“土地请站起来说话——台湾诗人詹澈论”，见詹澈：《詹澈诗选》，台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370页。

来倡导甚至制定新诗的文体规则还名正言顺，可以服人。冯雪峰并不是诗人，只是文化官员，也以权威的身份来谈论新诗的形式建设，就显得有些“外行”，他甚至将“自由诗”与“散文诗”混为一体。

自由诗与散文诗在新诗草创期确实被混为一体，但是很快就被视为两种不同的诗体，甚至有人认为散文诗不是诗，周作人认为散文诗是诗与散文之间的桥。沈尹默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上的《三弦》是他入选中国第一套新文学大系诗集中唯一的一首“新诗”。周作人在《小河》发表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时在《题注》中说：“有人问我这诗是什么体，连自己也回答不出。法国波特来尔（Baudelaire）提倡起来的散文诗，略略相像，不过他是用散文格式，现在却一行一行的分写了。内容大致仿那欧洲的俗歌；俗歌本来最要叶韵，现在却无韵。或者算不得诗，也未可知；但这是没有什么关系。”^①但是胡适把《小河》视为新诗的草创期的“杰作”：“最明显的例就是周作人君的《小河》长诗。（《新青年》六卷二号）这首诗是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但是那样细密的观察，那样曲折的理想，决不是那旧式的诗体词调所能达得出的。”^②1922年前后出现了散文诗是否是诗的大讨论。滕固认为：“散文诗是诗中的一体，有独立的艺术的存在，也可无疑。”^③穆木天1926年1月4日给郭沫若的信中认为：“中国一般人对散文诗，是不是有了误解我不知道。我自己懂散文诗不懂，我也不敢说。在我自己想，散文诗是自由句最散漫的形式。虽然散文诗有时不一句一句的分开——我怕它分不开才不分——它仍是一种自由诗罢？所以要写成散文的关系，因为旋律不容一句一句分开，因旋律的关系，只得写作散文的形式。但是它的诗的旋律是不能抹杀的，不是用散文表诗的内容，是诗的内容得用那种旋律才能表的。……我认为散文诗不是散文，……散文诗是

① 周作人：“小河”，载《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1919年2月15日。

② 胡适：“谈新诗——八年来的一件大事”，见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295页。

③ 滕固：“论散文诗”，载《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2年2月1日。

旋律形式之一种，是合乎一种内容的诗的表现形式。”^① 1926 年是新诗诗体的建设年，自由诗与散文诗的文体界限已经非常明显。

1958 年 3 月 22 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讲话中指出中国诗的出路是民歌和古典，要求新诗的形式是民歌，后来由各地党委组织，开展了一场全民性的“新民歌”运动，王老九等一些农村诗人纷纷登上了由政府主办的“赛诗台”。尽管这些农村诗人参加赛诗会的很多诗作都不是出自他们之手，而是由文人诗人当“枪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多文人流落民间。笔者的伯父王北军就为四川合江的农民诗人王月村写过大量诗作，但是文人诗歌的特性，如精神的主体性和文体的自由性荡然无存，写出的完全是响应政府号召的“指令性”诗歌，如同科举考试要求写的“试帖诗”，内容与形式都被严格规范。所以只在“识字班”里被“扫盲”过的王月村能够顺利参加大队、公社、区、县、省甚至全国性的“农民赛诗会”。

台湾没有大陆诗坛那种声势浩大的“自由诗”与“格律诗”争论，闻一多和徐志摩在 1926 年倡导的追求“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的准定型诗体“新格律诗”远没有不定型诗体自由诗受欢迎。如纪弦在 1961 年说：“是的，直到今日，这还是一个自由诗的时代。自由诗的路还没有走完。而在自由诗的世界里，还有许许多多高山大川没有被人发现，还有好大一片处女地有待开垦。对于有写自由诗的才能的人们，这还是一个大有作为，大可以一显身手的时候。”^② 台湾新诗也没有走诗体自由化或格律化的极端，少有胡适与郭沫若和艾青倡导的那种“诗体大解放”和追求诗的“散文美”的自由诗。

“‘世代’是文学社会学的重要概念。一批年龄相近的写作人，在某一个时间阶段呈现的文学景观，包括创作行为及活动方式等，在多样的面貌中存在着某些一致性，或可称之为‘世代性’。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它

① 穆木天：“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见陈惇、刘象愚编选：《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39 ~ 140 页。

② 杨宗翰：《台湾现代诗史》，远流图书公司 2002 年版，第 296 页。

常是检验文学发展的重要指标。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新世代’。”^①台湾诗人的诗体意识随着时代而减弱，形成了“诗体解放”及“诗体自由化”态势。不同世代的诗人关注的诗体元素也有差异。前行代诗人承接的更多是20世纪上半叶的新诗传统，具有较强的诗体意识，普遍重视诗的音乐性，不少诗作堪称新格律诗，如钟鼎文的《长城》、纪弦的《云和月》、彭邦楨的《月之故乡》、商禽的《凯亚美厦湖》、痖弦的《歌》、余光中的《乡愁四韵》。中生代诗人只具有一定的文体自律及诗体自觉意识，不重视诗的押韵，只适当重视诗的“固定行数”。以杜十三的《密码》为例：“才输入一个密码/整个世界便开始氧化/所有的女人充满了爱/所有的男人充满了欲望//才输入一个密码/整个世界便开始还原/所有的女人化成了水/所有的男人化成了烬。”新世代诗人较推崇诗体的自由，“为我所用”地使用和调整已有诗体，几乎没有押韵意识，只有少数诗人有“固定行数”意识。

文体学主要指体裁学（文类学）与风格学，主要研究文本的体裁特征、本质及其规律，尤其重视文体的生态及功能。文体学研究应该是文艺学、语言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甚至伦理学等学科交融的跨学科研究，主要分为形式文体学、功能文体学、文学文体学、语言学文体学等。19世纪后，新文体的产生周期由过去的每50年减为每10年，文体学受到重视，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异彩纷呈。巴利认为文体学的任务是探讨表达感情特征的语言手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斯皮泽将文体学视为连接语言学与文学史的桥梁，要求通过文体研究考察作者心灵、集体意识及民族思想文化的流变历史。韦勒克与沃伦的《文学理论》认为文体学研究一切能够获得某种特别表达力的语言手段。受巴赫金对话理论及福柯话语理论影响，话语文体学及历史/文化文体学受到重视，文学生态及文学功能研究成为文体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一些文体学家想借此揭示和批判语言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通过研究文体的复杂结构反思社会生活，特别是社

^① 李瑞腾：“《新世代诗人诗作论述》前言”，载《台湾诗学季刊》第32期，第6页。